

虞舜文化研究三则

□ 孙淑英 丁金龙

一、如何看待虞舜文化研究中的故事讲述

在虞舜文化研究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讲故事”的文本,对于这些文本往往被称为“戏说历史”,认为不可取、不可信。龚鹏程先生在《讲史的门庭》(《读书》2002年12期)一文中认为这种情况根源于宋代的“讲史”,在详细地分析了宋代以来小说和讲史的区别后,进一步指出“讲史”在宋代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家数”。正如《梦粱录》所记载“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三遂平妖传》、现代高阳的小说都被作者列入到讲史的行列。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虞舜文化研究中的故事讲述也是一种“讲史”。

对于这种文本,笔者认为,“讲史”所要讲的是整体的、统包的、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脱离的历史命运,即使“只讲一人一事,其所叙述的仍然不是个体的对象,而仍是整体的历史命运。由一人一事见整体。只有整个历史的动向,才是讲史的叙说主角。”而且,讲史“必须建立在时间空间的坐标上”,“严格采用编年叙述的方法”。讲史的作用与小说不同,“它是以描述历史、说明历史为何如此为宗旨的。提供读者与听者历史知识,让他们获得历史感,得到历史知识的满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讲史者事实上进行着与正统史学家完全一样的历史叙述工作”

至于如何从历史研究的层面来看待讲史甚至讲史者,龚鹏程先生做了如下的阐释——

讲史者“总是希望所讲的历史能给人慰藉、寄托,给人以价值、意义。故其中满含着价值判断、意义说明,不是单纯且客观的叙述。”“充满了主观的感情、偏见以及他对历史的解说。”作者强调这是讲史的传统。不仅古之讲史如此,今之讲史亦然。但

是,讲史与正统史家一样,都要对历史做出解释,前者甚至“有比一般正史更多的历史解释”。在讲史常见的有“因果论和天命论”,“认为历史是在杀伐中发展的,……总之是冲突造成了历史的发展”。

基于此,龚鹏程先生为古今讲史者做了学术性的辩护: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事件,而是‘被叙述的文本’”。“‘讲史’符合了历史叙述的四项要求:一,它基本是编年的。二,是一种‘有含义的叙述’,且从这件事乃至历史这整体意义上来展开叙述。三,它对意义之掌握,主要不是来自史料,而来自叙述者的历史之想象。这种想象包括了他叙述的语言、分类与编排的概念、生命气质、历史观等等。四,它也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求。”“因此,它是一种真正合格的历史叙述,同时也是文学性文本。”

但对于这种合格的历史叙述,他也含蓄地指出,讲史者的一切谈说,需建立在社会公众所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对于这一点,是我们在进行虞舜文化研究中所必须注意的

二、舜帝陵历史不晚于唐代的一则史料

在李百勤先生编著的《河东出土墓志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一书中,收录了一方出土于运城(即现在的盐湖区)唐大和三年(829年)的《张瑗墓志铭》。在该墓志铭中记载了张瑗“溘然殁于涑滨之私第,春秋六十三。其年,岁次戊申八月十九日迁窆里第之面原,鸣条陌之西趾,古虞□之东,偏衬先茔之次后,礼也。”这段记载中涉及到涑滨、鸣条陌西趾、古虞□三个地点。涑滨,当指涑水之滨。“鸣条陌西趾”,应为现在所说的鸣条冈西端,“古虞□”亦应为一地名,而且也在鸣条陌之西趾。“古虞□”在这里使用,一是考虑到语言对仗,二是可以更

确切地指明张瑗墓葬所在位置。为了弄清“古虞□”中的缺字,笔者曾在原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找到了这个墓志,确认该字已随石块剥落而不可知。

从此文看,张瑗家族的墓地就在涑水之滨,鸣条冈之西,“古虞□”之东。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舜帝陵就在古涑水的南边,鸣条冈的西端,“古虞□”写在墓志铭中,且与鸣条冈一词对应使用,可以理解为“古虞□”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推测“古虞□”中的缺字很有可能就是“陵、冢、庙、城、地”等几字,不论哪一字都可以视其与舜帝陵有历史渊源。

张瑗墓志铭的凿刻年代为公元829年,在发现的相关舜帝陵的文化遗物中是比较早的,它为我们研究虞舜文化和舜帝陵的历史增添了一条新的资料,如果能够访查到这块墓志铭的具体出处,那将会为我们寻找早期舜帝陵的位置提供帮助。毫无疑问,这块墓志铭将是与舜帝陵密切关联的一件极珍贵的历史文物。

三、虞舜部族完全有可能活动于运城盆地

在考古学发展的今天,对于上古帝王的活动地域的探讨日益增多,如何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待虞舜文化,尤其是虞舜部族的活动地域,是较为迫切的一件学术工作。

2003年,考古工作者曾撰文指出虞舜部族所处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而虞舜部族的遗存有可能是三里桥文化(运城盆地是三里桥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或者陶寺文化的中晚期^[1]。现在回头来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讨虞舜部族遗存以及对其进行确认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在2003年之后的两个年度里,国家博物馆曾在运城盆地进行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运城盆地全覆盖式田野调查”工作。当时在涑水河上游发现一个超大型聚落遗址,也是龙山时代运城盆地目前发现的唯一具有古代“国”之气象的聚落。

古史记载,舜母“见大虹意感而生舜”,而清代学者桂馥指出“虹俗谓之绛”,裴松之注《三国志》说“虹音绛”,陈星灿也提到他的家乡河南长葛也把“虹”称作“绛”^[2]。而这一称呼至少在盐湖区也存在^[3]。涑水河上游绛县之“绛”一名的来历已不可考,但已有研究者指出“气象地名,在我国是很多”^[4]。这无疑赋予了我们在研究虞舜文化时一定的想象空间,也许,绛县本意就是“虹”县。

此外,古代“祷雨有应致祭曰谢降。亦伪作酱音,盖虹出则雨祭,不出则雨足,故得雨而谢降也”,这表明在古人心目中,虹是一种具有“神性”的物质。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在虞舜的部族中,有把虹作为图腾崇拜的。也有的研究者则进一步从甲骨文、《说文解字》等古代文献以及陶寺出土的龙盘切入,对古代“龙”和“虹”的形象做了讨论,并认为,对“虹”的崇拜“也应是舜族龙崇拜的表现”^[5]。

与上述阐释、讨论相关联的是以豢龙而“服事帝舜”的董父,文献记载:“闻喜东北有董池陂,是醴川,即董泽,舜所封董父之国也”。此董国后被晋武公灭掉。因为棚国的发现,我们对西周时的封国之小,有了具体的认识,于是可以推定:在今闻喜东北方存在一个小小的封国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个封国却又非董国莫属。

2007年,在闻喜县东镇官庄盗墓分子曾盗走了西周中期贵族重器,虽然被截获的仅有2簋、2壶、1盘,但这一发现无疑支持了闻喜东北就是董国所在地的文献记载。

综合以往考古学的认识与论证、文物的发现,以及对“绛”、“虹”、“龙”、“董国”的考虑,虞舜部族最初就活动于运城盆地一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考古学文化与一个部族的对应问题上,我们尚有很多的环节有待研究,尚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来对此作出解释。

[1] 丁金龙《虞舜文化的考古学认识》,《虞舜文化考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12页。

[2] 陈星灿《虹与绛》,《读书》2000年2期,116页。

[3] 贾献、王容《历史回顾》,335页,1999年出版。

[4] 曹强吾、李报国《趣谈气象与地名》,《地名知识》1983年4期。

[5] 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36页。

(孙淑英,山西省运城市河东博物馆;丁金龙,山西省运城市文物工作站)